第 2 卷第 1 期　　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　　Vol. 2, No. 1: 94-108
2026 年 3 月　　Research in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March 2026

政治王朝下的经济发展：菲律宾模式

罗纳德·门多萨　胡雷尔·亚普　加布里埃尔·门多萨
莱昂纳多·哈米诺拉三世　埃里卡·余*

【摘　要】菲律宾模式可以作为政治王朝下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政治王朝是指同一家族不同成员连续或同时担任公职的现象。该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既见于诸多发展中国家，也见于众多发达国家。以菲律宾为例，该国约 80%的国会议员与超过 50%的地方民选官员来自政治家族。已有诸多研究证实，政治王朝往往通过滥用公共权力攫取社会资源、抑制市场竞争、削弱经济活力，最终加剧贫困问题。对菲律宾的实证研究显示，政治王朝显著加剧了非吕宋岛地区的贫困程度；而在吕宋岛地区，二者并未呈现明显关联。进一步研究表明，吕宋岛地区的独立经济精英群体有效制衡了政治王朝的负面作用。这一制衡效应源于三大机制：一是经济精英可以“用脚投票”；二是经济精英可以对抗政治王朝；三是经济精英与政治王朝可以形成潜在利益捆绑，共同推动本地经济长期发展。

【关键词】政治王朝；经济精英；菲律宾模式

一、引言

政治王朝指一种以亲缘关系为纽带，通过家族成员影响政治权力、实现权力与资源家族化传承的政治形态，通常表现为同一家庭的若干成员连续或同时担任经选举或任命的公职。以菲律宾为例，几乎 80%的国会议员

* 罗纳德·门多萨（Ronald U. Mendoza），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政府学院；胡雷尔·亚普（Jurel K. Yap），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政府学院，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犯罪学与刑事司法学院；加布里埃尔·门多萨（Gabrielle Ann S. Mendoza，通信作者），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政府学院，E-mail：gabrielleannsm@gmail.com；莱昂纳多·哈米诺拉三世（Leonardo Jaminola Ⅲ），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政府学院；埃里卡·余（Erica Celine Yu），荷兰蒂尔堡大学人文与数字科学学院。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和超过 50%的现任民选地方政府官员都有亲属曾经或者正在担任民选公职(Mendoza et al.,2022)。在全球诸多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政治王朝作为一种特殊权力形态长期存在,其对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贫困问题的影响,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公共治理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诸多研究指出,政治家族长期垄断选举资源、掌控政策制定权与利益分配权,往往会削弱市场竞争性。这一现象往往导致市场扭曲与资源错配,同时降低教育、医疗与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供给效率,最终加剧贫富分化。深入研究政治王朝影响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与作用机制,有助于揭示治理效能与不平等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理解政治制度、社会流动性与贫困治理的互动关系提供关键视角。同时,也可以提供针对性的治理方案,优化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帮助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后续部分按照以下思路展开:第二节明确政治王朝这一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普遍存在,尽管表现形式因国家与地区差异而有所不同。第三节系统梳理政治王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政治王朝往往通过滥用公共权力攫取社会资源、抑制市场竞争、削弱经济活力,最终加剧贫困问题。第四节着重分析独立经济精英群体对政治王朝的制衡作用,具体而言,这一制衡效应源于三大机制:第一,经济精英可以"用脚投票"对抗政治王朝的掠夺性政策;第二,经济精英具备与政治王朝博弈抗衡的能力;第三,经济精英与政治王朝可以形成潜在的利益捆绑,进而协同推动本地经济的长期发展。第五节结合实证证据指出,菲律宾作为政治王朝现象较为典型的国家,其政治王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存在显著地域差异性:政治王朝显著加剧了非吕宋岛地区的贫困程度;而在商业环境更具竞争性的吕宋岛地区,二者并未呈现明显关联。政治王朝对贫困的影响,在吕宋岛更多体现为以间接参与企业经营的方式介入经济活动,而在非吕宋岛地区,则更多来自政治权力垄断带来的直接影响。吕宋岛凭借其独特的制度条件与优越的营商环境,推动经济精英形成独立的制衡力量,有效降低政客直接掠夺行为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后,本文在第六节提出,可通过加强商业竞争、削弱政商利益关联、推动反垄断政策落地等举措,遏制政治王朝势力的蔓延态势。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二、政治王朝在当前世界范围内仍然普遍存在

政治王朝的核心特征是对关键权力的系统性垄断:其依托家族血缘与裙带关系网络,干预选举流程、掌控选举资源,通过代际传承巩固家族占据的核心政治职位,进而影响资源分配、法律制定等关键权力领域。在此基础上,政治王朝借助倾斜性的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将公共资源转化为维系家族特权的工具,为家族成员及其盟友谋取经济利益。政治王朝构建了事实上的权力世袭体系,是政治精英阶层自我复制、固化特权的典型体现。政治精英往往扭曲制度设计的初衷,将本应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制度框架异化为谋求自身权力延续与扩张的工具,最终侵蚀政治竞争的公平底线,弱化权力问责机制,对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构成深远挑战。

政治王朝是特定家族及少数精英集团通过家族传承形成的政治形态,尽管其具体表现形式因政治制度差异而有所不同,但这一现象在全球诸多国家与地区仍广泛存续。Dal Bó et al.(2009)通过分析美国建国后的国会议员数据发现,政治王朝现象在美国长期存在,尽管随时间呈现下降趋势,例如 1789—1858 年,约 11%的国会议员有亲属曾担任国会议员,而这一比例在 1966 年后降至 7%。同时,政治王朝存在明显的自我延续倾向,其成因并非家族遗传赋予的才能或偏好,而是在位者利用职权和政治资源,为后代营造了竞选优势。Camp(1982)基于 1935—1980 年 1363 名墨西哥核心政治职务的领导人背景资料展开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其中 29%～30%来自政治活跃家族,反映了政治家族在墨西哥政治体系中具有较高的普遍性。Querubin(2016)基于 1946—2010 年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菲律宾约 50%的国会议员及各省省长,其亲属均在过去二十年间曾担任国会议员或省长职务。Asako et al.(2015)的研究指出,日本国会议员中存在相当比例的政治王朝群体,具体而言,近二十年间出任首相的 11 人中有 7 人属于这一群体,且近几十年日本众议员中政治王朝出身的政治家比例达到 20%～30%。Smith and Martin(2017)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944—2016 年当选的爱尔兰众议院议员中有 25%出身于政治家族,这一比例在内阁部长群体中升至 29%。Fiva and Smith(2018)的研究则显示,挪威议会中约有 7%的议员来自政治家族。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三、政治王朝对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贫困问题的影响

政治王朝依托恩庇侍从关系构建利益网络，通过滥用公共权力攫取社会资源，以此建立并巩固自身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进而压缩政治竞争空间，破坏问责机制的有效运行。这种权力监督的失效，不仅会扭曲社会资源配置，更会削弱制衡效能。恩庇侍从关系的本质，是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主体间的利益交换：掌控较高权力和影响力的庇护者，会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有选择性地进行有形或无形的资源分配，以此换取后者的政治支持，包括选票支持、政治忠诚和响应政策诉求等。这种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换，能够巩固庇护者的权力基础，也能为被庇护者提供生存发展资源，最终形成一种互利共生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该制度在特定环境下虽然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但也极易侵蚀制度的公平性与公正性，阻碍规范化治理，降低整体治理效能。当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有效制约与监管时，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便会凸显。

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由政治王朝主导的政治形态往往与治理不善密切相关[①]。既有文献的研究一方面聚焦政客及其家族维系权力的路径，另一方面也对政治王朝的社会经济效应进行了深入探究。Balisacan and Fuwa(2004)指出，菲律宾缺乏竞争性的制度运行体系，是导致政策失效与经济表现平庸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该研究并未在更深层面提供政治王朝与贫困之间关联的有力证据。Acemoglu and Robinson(2006)指出，技术与制度变革会改变社会权力结构，削弱政治精英的在位优势，提高其被替代的风险，使其为保住权力与未来经济租金，主动阻碍本可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变革，最终导致国家陷入经济落后。Acemoglu et al.(2014)的实证分析进一步显示，在塞拉利昂，传统政治家族通过垄断资源与政治压制，形成对公民社会的控制，降低了公共品供给效率，削弱了公民社会的权力制衡能力，是该国经济发展滞后的关键原因之一。Mendoza et al.(2016)的研究发现，政治王朝的掠夺性本质、制度操控行为与机会垄断倾向，会导致社会资源依据对政治家族的忠诚度而非实际需求进行分配，这不仅减弱

① Abdurahman et al.(2025)基于 Scopus 数据库展开文献计量分析，选取该数据库 2000—2025 年间政治王朝领域的 266 篇文献，梳理了该领域的知识结构与演进脉络，同时明确了当前研究热点与未来发展趋势。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了减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还抑制了市场竞争活力，阻碍了社会流动，最终导致经济活力不足与贫困问题恶化。此外，Geys and Smith(2017)系统梳理了政治王朝的形成原因、研究脉络、核心结论与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同时指出，政治王朝的存续会加剧资源分配不公，滋生腐败与寻租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四、独立经济精英的关键制衡作用

独立且具有竞争力的经济精英群体，能够有效约束政治王朝的掠夺性行为，对冲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通过多重机制调节政治王朝与贫困之间的关联路径。

第一，经济精英的流动性可被视为一项关键政治制衡机制。由于经济资源具备跨区域流动的属性，若政治王朝治理不善、过度挤压商业利益，实施征收高额税赋、强占土地等掠夺性政策，经济精英便会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主动收缩业务规模，或将资本与产业转移至营商环境更优的地区。这一行为将直接导致地方经济衰退，进而削弱甚至动摇地方政治王朝的统治根基。正是这种潜在的退出威胁，迫使政治王朝在一定程度上兼顾经济精英的利益诉求，约束自身的掠夺性行为，转而提供更友好的营商环境与高质量的公共服务。Acemoglu and Robinson(2008)的研究指出，那些与当地政客无直接关联的独立经济精英，能够打破政治精英与依附性经济精英结成的利益同盟。此类精英群体不依赖政治特权攫取利益，而是以公平的市场规则与完善的产权保护为存续发展的基础，其掌握的资本、技术等核心资源，将迫使政治精英在垄断特权与经济发展之间作出权衡取舍，进而缓解特权带来的市场扭曲，对冲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Acemoglu and Robinson(2013)强调，经济精英的流动性是打破权力世袭格局的关键：商人阶层的潜在退出威胁会使掠夺型政权面临税基流失与经济萎缩的困境，迫使当权者通过制度优化来留住核心生产要素。历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英国正是通过限制君主权力、构建产权保护体系，成功吸引了欧洲大陆的资本与人才，最终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与之相反，汲取型制度国家难以留住关键资源，长期陷入发展停滞的泥潭。威尼斯、拉丁美洲与刚果的发展困境，以及英国的制度转型，均揭示了生产要素流动性对当权者行为的约束效应。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第二,政商之间的制衡关系能够从客观上约束政治王朝的掠夺性行为,是决定当地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商人群体凭借其掌握的经济资本(如资金支持)和社会资本(如人力资源动员能力),可构建起对抗政治权力的结构性力量。在具备地理优势与制度优势的区域,持续流入的商业投资赋予当地政治家与企业谈判的筹码,双方形成相互对抗、彼此制衡的关系——政治王朝不会以牺牲商业关系为代价独占资源,而是希望通过做大经济蛋糕实现利益共享。同时,经济精英还可以依托商业协会等组织化形式游说政府,推动政策透明化改革,或通过资助反对党派形成对政治王朝的外部制约。与之相反,在经济禀赋匮乏的地区,企业的经营活动因高度依赖政府支持,易与政治力量形成共谋格局,最终导致政商制衡机制的缺失。尽管在此过程中,王朝政客同样追求经济增长,但其发展成果往往仅惠及少数精英群体,而非广大民众;政治王朝推行的掠夺性更强的政策,往往在为自身攫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以牺牲普通民众的生计福祉为代价。Bates(1981)指出,肯尼亚的经济精英通过联合行动推行合理政策,能够有效对抗政治领袖的不当行为,有助于改善经济表现,而加纳的可可小农却无法通过有效合作进行对抗。Doner and Schneider(2000)也指出,经济精英可以借助商业协会等组织化形式整合利益、协调行动,通过游说争取更完善的产权保护与更有效的治理环境,而竞争性市场环境有利于商业协会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积极的干预与推动作用。

最后,经济精英可以通过利益捆绑机制与政治王朝实现资源交换,进而形成对后者的隐性约束。经济精英的核心筹码在于对关键经济资源的掌控,在利益捆绑关系中,他们通过提供产业投资、税收贡献、就业岗位等核心经济支撑,成为政治王朝维持统治合法性与治理效能的关键依赖。这种深度交织的利益绑定,赋予了经济精英与政治力量讨价还价的重要资本。具体而言,商人群体可通过提供选举资金、政治献金等方式,激励政治精英推行有利于当地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若政治王朝未能兑现经济发展承诺,商人群体则可采取撤回资金支持、转向竞争对手等策略,形成对掌权者的问责压力,倒逼政治决策在短期政绩诉求与长期发展目标之间寻求平衡。

五、基于菲律宾的实证分析

菲律宾的政治王朝现象至今仍广泛存续,已对该国的政治竞争生态、治理质量与发展成果造成严重侵蚀,成为制约减贫进程与可持续发展的持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续性障碍。这一世袭格局的形成，深深根植于菲律宾的殖民历史：西班牙殖民者通过推行世袭贵族制度，与本土精英构建起紧密的权力网络，而后续建立的选举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格局的合法性基础。当前，政治王朝主要依托资源垄断、选举操控与裙带关系维系权力，直接导致治理效率低下、腐败问题蔓延，同时持续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尽管菲律宾民众对传统家族政治的不满情绪凸显，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民众难以对这一现象形成实质性约束。Mendoza et al.（2016）的研究发现，若以现任官员有亲属曾任或正在担任民选职位为界定标准，菲律宾国会中政治王朝成员占比已超过 70%；并且，政治王朝控制的地区，贫困率显著更高，尤其在除吕宋岛以外的农业地区，政治王朝通过资源垄断、裙带主义、抑制竞争及扭曲扶贫政策等方式，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不平等。Querubin（2016）则聚焦菲律宾政治王朝的长期存续机制，其研究指出，官员往往借助职权与公共资源为亲属竞选铺路，政治家族通过控制地方资源、缔结选举联盟、主导政策制定等途径，构建起稳定的庇护网络，从而实现权力的代际传承。在此背景下，菲律宾的政治制度呈现表面民主、实质固化的特征，家族轮替率极低，政策制定更倾向于保障短期利益，公共品供给与长期发展投资受到严重抑制，最终导致经济不平等进一步固化，使国家陷入政治王朝存续与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Mendoza et al.（2019）的后续研究进一步揭示，菲律宾政治王朝现象当前呈现持续恶化的趋势，有家族成员同时在政府任职的民选官员比例从 1988 年的 19%攀升至 2017 年的 29%，少数核心家族的控制能力空前强化，政治版图愈发固化。这些家族通过扭曲制度规则，持续加剧社会不公。此外，与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菲律宾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存在高度重叠，二者之间长期维系根深蒂固的利益关联（Anderson，1988；Hutchcroft，1991；Bello et al.，2005）。

既有关于政治王朝经济影响的研究文献，大多聚焦政治权力垄断这一维度，未能对政治集中度与经济发展滞后之间的关联存在显著地域差异的现象给出合理解释。Balisacan and Fuwa（2004）的研究指出，经济增长虽是菲律宾减贫的核心驱动力，但减贫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国家整体的经济增长并未有效缓解地方贫困问题，这一现象在初始不平等程度高、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制度基础薄弱的地区表现尤为突出。Mendoza et al.（2016）针对菲律宾的实证分析进一步佐证了政治王朝与贫困之间的显著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距离国家首都较远的非吕宋岛地区（米沙鄢群岛和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棉兰老岛）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地域差异的形成，根源在于吕宋岛与非吕宋岛地区在经济活动模式、治理实践路径以及民众社会参与程度等方面存在的系统性差异。作为菲律宾首都所在地和政治、经济、教育、科研与商业贸易核心区域，吕宋岛汇集了菲律宾全国的资本、产业与政策资源，这里市场机制相对健全，社会治理更加规范；而非吕宋岛地区则以农业与采矿业等为主导产业，远离权力中心，发展模式单一，制度支撑体系薄弱，市场机制尚未完善，其治理模式高度依赖政治家族构建的庇护网络，政治王朝通过垄断资源、扭曲扶贫政策等手段进一步加剧贫困，因而这些地区成为政治王朝与贫困关联性表现最为显著的区域。

理论上，独立且具有竞争力的经济精英群体有利于制约政治王朝的掠夺性行为，对冲其对减贫进程的负面影响。Mendoza et al.（2022）围绕独立经济精英的制衡作用展开研究，基于 2006—2018 年菲律宾 81 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借助 Hausman-Taylor 模型，对强势王朝[①]与活跃独立经济部门的存在对贫困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表 1 列出模型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包括贫困率[②]、强势王朝比例、商业活力、国内税收分配、与马尼拉距离与所有权。由表 1 可知，与非吕宋岛地区相比，平均而言吕宋岛地区的贫困率更低，但二者强势王朝比例相当，即存在两名及以上家族成员担任民选公职的政治家族均占据了约四分之一的民选地方职位。

表 1　模型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连续变量	全样本			吕宋岛地区			非吕宋岛地区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贫困率	386	0.25	0.14	189	0.18	0.12	197	0.31	0.13
强势王朝比例	386	0.24	0.09	189	0.25	0.10	197	0.24	0.08
商业活力（单位：百万比索）	386	10.02	21.54	189	15.41	28.52	197	4.87	8.76
国内税收分配（单位：百万比索）	386	898.40	634.78	189	964.87	716.87	197	834.62	538.73

① 本研究中“强势王朝（fat dynasty）”的定义为：同一省份内存在两名及以上家族成员同时担任民选公职的政客家族。这一概念与“弱势王朝（thin dynasty）”相对，后者指来自同一政治家族的成员依次担任经选举产生的公职。在回归分析中，本研究选取菲律宾各省民选地方职位中强势王朝政客的占比作为核心指标，用以测度省级层面政治王朝的普及程度。

② 这里家庭贫困发生率以平均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比例衡量，使用菲律宾统计署发布的 2006、2009、2012、2015、2018 年的三年一期省级数据，因此分析样本仅包含这五年的观测值。此外，由于数据限制，样本中不包括首都马尼拉大都会地区，因为该地区在行政上不被视为省级行政区。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续表

连续变量	全样本			吕宋岛地区			非吕宋岛地区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与马尼拉距离（单位：公里）	386	742.69	486.11	189	336.81	197.40	197	1132.07	339.91
分类变量（所有权）	全样本			吕宋岛地区			非吕宋岛地区		
	频率		比例	频率		比例	频率		比例
无(0)	22		10.84%	10		9.90%	12		11.76%
很少(1)	62		30.54%	35		34.65%	27		26.47%
中等(2)	38		18.72%	13		12.87%	25		24.51%
较多(3)	81		39.90%	43		42.57%	38		37.25%

数据来源：Mendoza et al.(2022)表 1。

为了更好地衡量经济因素对贫困的影响，特别是独立经济精英对政治王朝权力的制衡机制，Mendoza et al.(2022)引入“商业活力”与“所有权”两组变量来分析商业活力高低和不同政商互动模式对贫困的影响。首先，“商业活力”变量指菲律宾地方政府财政局(Bureau of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BLGF)的年度商业税收收入，反映经济部门的整体活跃度与竞争力，也间接反映商业部门的独立性与制衡能力。这一变量越大，就越能体现地方经济精英群体的商业活跃度与竞争力，也越能表明地方经济领域更多由市场竞争主导，而非由政治特权主导。吕宋岛地区的商业活力平均值达 1541 万比索，远高于非吕宋岛地区的 487 万比索(见表 1)。这一数值差异暗示着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精英独立性力量的悬殊：吕宋岛聚集了贸易、制造业、服务业等多元领域的竞争性企业。如果条件允许，地方经济精英可通过开拓市场、吸引投资、创造就业机会，逐步形成独立于政治王朝的经济力量。若经济精英的实力足够雄厚，他们便有可能约束政治王朝的掠夺性行为。这类经济精英能够在与政治精英合作但不完全依附于后者的前提下，获得有利的营商环境与发展资源。对此的一种解读是：经济精英能够提升权力制衡水平，推动经济“蛋糕”做大，并促成审慎的公共政策，同时约束政治行为体最为恶劣的攫取行为。反观非吕宋岛地区，其商业活动发展滞后，经济结构高度依赖农业、采矿等资源型产业(往往更具垄断性)，经济精英缺乏充足的市场发展空间，且在采矿许可、土地审批等关键领域高度依赖政治王朝以获取商业资源，独立性相对薄弱。

其次，“所有权”变量定义为政客对当地企业的持股情况，既反映了政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重叠程度[①],又反映出政治权力向经济领域的渗透深度,为测度政商互动模式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指标,也是理解经济精英制衡作用的关键依据。该指标数值越高,意味着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融合程度越深,地方经济活动越容易受政治家族及其利益关联方的控制。在此情形下,普通经济主体力量薄弱,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形成独立经济精英群体的难度较大,对政治王朝权力的制衡能力也随之被削弱。专家调查数据显示,与非吕宋岛地区相比,吕宋岛地区政客的企业所有权比例更高(如表 1 所示,42.57%的受访者认为当地政客在本省企业中持股比例"较多",而非吕宋岛地区这一比例为 37.25%)。

此外,本研究还引入两组控制变量:(1)"国内税收分配",这是菲律宾的一项核心财政拨款制度,指中央政府将全国征收的部分税收,按法定比例分配给地方政府,用于支持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2)"与马尼拉距离",马尼拉的制度优势和经济优势可能通过溢出效应扩散到周边地区,距离首都越远,中央监督越薄弱、制度建设越滞后,容易导致治理不善[②]。Mendoza et al.(2022)通过实证分析并对比吕宋岛与非吕宋岛地区的政治生态与经济发展状况(如表 2 所示),得出以下三方面核心结论。

第一,政治王朝与贫困之间整体呈现显著相关关系,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从全国样本来看,以强势王朝比例衡量的政治王朝与贫困发生率呈显著正相关,如表 2 中的"全国(2)"列所示。这表明政治王朝导致的权力集中会加剧贫困,与多项菲律宾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Balisacan and Fuwa,2004;Teehankee,2012;Mendoza et al.,2016;Querubin,2016)。同时,相较于经济独立性与经济活动的作用,政治王朝现象的盛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度更强,这一结论印证了 Bates(1981)与 Acemoglu and Robinson(2008)的观点。数据进一步揭示了区域差异:非吕宋岛地区二者的相关关系显著,而吕宋岛地区则未呈现明显关联,详见表 2 中的"吕宋岛地区(4)"列与"非吕宋岛地区(6)"列。

---

① 该指标基于马尼拉雅典耀大学政府学院开展的省级专家调查构建。该调查对菲律宾各省,分别选取一名商业团体领导人、一名民间社会组织领导人及一名商业领域研究学者,由其对本省政客在当地企业的持股比例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划分为"无/很少/中等/较多"四个等级。

② 为避免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除了"与马尼拉距离"这一时不变变量外,所有自变量均滞后两年处理。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表 2 主要变量对贫困的影响

变量	全国 (1)	全国 (2)	吕宋岛地区 (3)	吕宋岛地区 (4)	非吕宋岛地区 (5)	非吕宋岛地区 (6)
强势王朝比例	−0.087	0.214**	−0.273**	−0.102	0.246**	0.706***
	(0.080)	(0.070)	(0.090)	(0.080)	(0.100)	(0.100)
商业活力（取对数）	−0.036***	−0.001	−0.035***	−0.001	−0.020***	−0.006
	(0.004)	(0.004)	(0.005)	(0.007)	(0.005)	(0.006)
所有权	0.030**	0.017*	0.026*	0.026*	0.043**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国内税收分配（取对数）		−0.049**		−0.056***		−0.062***
		(0.020)		(0.010)		(0.020)
与马尼拉距离（取对数）		0.078***		0.055***		0.199***
		(0.009)		(0.010)		(0.030)

数据来源：根据 Mendoza et al.(2022)附录的表 A、表 B 与表 C 整理得到。

注：*、**、***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第二，政商互动模式与贫困问题存在密切关联，且这种关联具有显著区域差异性。政治王朝对贫困的影响既包含直接作用，也包含间接传导机制。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力垄断，即前文所述“强势王朝比例”对贫困的直接作用。而在间接作用方面，政治王朝还可通过经济利益掠夺进一步加剧贫困。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政治王朝的职位垄断问题，却相对忽视了政客通过企业所有权实现的政商深度绑定及相应的经济利益掠夺行为。事实上，政客的企业所有权正是经济利益掠夺路径的核心体现——政客通过参与企业经营强化对商业领域的控制，进而在公共资源分配与政策制定过程中向关联企业倾斜，既挤压普通企业的生存空间，又会导致公共服务投入不足。

对菲律宾全国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政客对当地企业的“所有权”与贫困存在显著关联，这表明政客对商业领域的控制权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王朝的贫困效应，如表 2 中的“全国(2)”列所示。同时，区域间作用机制呈现明显分化：在吕宋岛地区，政客企业所有权对贫困的加剧作用明显，但政治王朝的直接影响并不突出；而在非吕宋岛地区，情况恰好相反，强势王朝的存续与贫困发生率呈现显著正相关，政客企业所有权对贫困的影响却无明显表现（见表 2 中的“吕宋岛地区(4)”列与“非吕宋岛地区(6)”列）。这一差异可能反映出两大区域政治王朝干预经济方式的不同。对吕宋岛的政治王朝而言，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收益，远高于实施直接掠夺行为的短期效益。因此，当地政客更倾向于收敛直接掠夺行为，转而通过亲自参与商业活动的隐蔽方式分享经济红利，其核心诉求也转向做大经济“蛋糕”以实现长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期获利。反观非吕宋岛地区,作用逻辑截然相反:当地政客仅凭政治权力即可掌控经济资源、主导经济运行并攫取利益,这意味着该地区的贫困根源在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本身,而通过参与经济活动或持有企业股权来获利的渠道与贫困的关联性可能较弱。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并非依托于富有竞争力与独立性的企业,而是高度依赖政府的政策倾斜与资源分配。我们也可以从不同地区主导产业类型的差异来解读这一现象。如前所述,吕宋岛的产业更为复杂、竞争更充分,而非吕宋岛地区则以更基础、易被垄断控制的产业为主导。

第三,上述"强势王朝比例"和"所有权"对贫困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间接反映了不同情况下经济精英独立性对政治王朝制衡效果的差异。吕宋岛的政治王朝对贫困的影响,更多体现为其通过间接参与企业经营的方式介入经济活动,而非诉诸直接掠夺,从侧面印证了当地经济精英的独立性对政治垄断的强大制衡作用。从表 2 数据可以看出,在引入"国内税收分配"与"与马尼拉距离"两组控制变量之前,吕宋岛地区的强势王朝对贫困有显著的减轻效应;即便引入控制变量之后,也未表现出加剧贫困的作用。反观非吕宋岛地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强势王朝均显著加剧了当地的贫困状况。值得注意的是,两大区域的强势王朝占比非常接近,而吕宋岛地区之所以呈现不同的作用效果,根源在于其远超非吕宋岛地区的商业活力(参见表 1)——当地经济精英能够依托充分的市场竞争拓展发展空间,从而维系自身的独立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吕宋岛地区的政客直接控制经济资源,经济精英难以成为约束政治王朝的独立力量,部分经济精英被迫依附于政治权力,与政治王朝形成深度共谋关系,而非构建相互制衡的博弈格局,最终二者合谋掠夺公共资源。制衡力量的缺位,使得非吕宋岛地区的政治王朝更倾向于推行掠夺性政策,进而加剧贫困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政商共谋关系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但发展成果只会被少数精英群体攫取,无法惠及广大民众。因此,尽管当地环境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模式的低包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问题)仍可能构成深层次的发展难题。综上,这些区域差异进一步佐证了如下结论:唯有当经济精英独立于政治权力体系,且具备自主的市场竞争力时,才能对政治王朝形成有效的制衡作用。

六、总结

独立经济精英群体深刻改变了政治王朝对贫困问题的传导路径与作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用机制。经济精英的“用脚投票”、对政治王朝的对抗，以及经济精英与政治王朝之间的潜在利益捆绑关系，共同构成约束政治王朝的重要制衡机制。本研究基于菲律宾政治王朝的实证分析，间接印证了独立经济精英在缓解贫困、优化治理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在投资水平与商业活力低迷的经济环境中（如菲律宾非吕宋岛地区的经济环境），政客极易受利益驱动，实施掠夺性行为；与之相对，吕宋岛凭借其完善的制度条件与优越的营商环境，推动经济精英形成独立的制衡力量，有效约束政客的直接掠夺行为，缓解其对贫困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良好的营商环境与独立经济精英的存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政治王朝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比吕宋岛与非吕宋岛的区域差异，可为制定针对性政策来约束政治王朝的过度掠夺行为提供重要依据。这些区域特征同时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行路径——未来可围绕经济发展滞后、自然资源开发、投资机会分配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进而构建能够阻断“政治王朝—贫困”传导链条的制度框架，例如通过加强商业竞争、提升政策透明度、削弱政商利益关联、推进必要的制度改革及推动反垄断政策落地等举措，从根源上遏制政治王朝势力的蔓延。

参考文献

Abdurahman A I, Dewi E A S, Rizal E, et al. 2025. Political dynasties in the age of democracy: a bibliometric study of global research patter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Open, 12: 101735.

Acemoglu D, Robinson J A. 2006.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1): 115-131.

Acemoglu D, Robinson J A. 2008. Persistence of power,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1): 267-293.

Acemoglu D, Robinson J A. 2013. Why nations fail[M]. London: Profile Books.

Acemoglu D, Reed T, Robinson J A. 2014. Chief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lite control of civil society in Sierra Leon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2(2): 319-368.

Anderson B. 1988. Cacique democracy and the Philippines: origins and dreams[J]. New Left Review,(I/169):3-31.

Asako Y, Iida T, Matsubayashi T, et al. 2015. Dynastic politician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Japan[J].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1): 5-32.

Balisacan A M, Fuwa N. 2004. Going beyond crosscountry averages: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Philippines[J]. World Development,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32(11): 1891-1907.

Bates R H. 1981.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llo W, Docena H, de Guzman M, et al. 2005. The anti-development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rmanent crisis in the Philippines[M]. London: Zed Books.

Camp R A. 1982.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Mexican politics: a preliminary view[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44(3): 848-862.

Dal Bó E, Dal Bó P, Snyder J. 2009. Political dynastie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6(1): 115-142.

Doner R F, Schneider B R. 2000.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y some associations contribute more than others[J]. Business and Politics, 2(3): 261-288.

Fiva J H, Smith D M. 2018. Political dynasties and the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party-centered environment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2(3): 706-712.

Geys B, Smith D M. 2017. Political dynasties in democracie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maining puzzles[J]. The Economic Journal, 127(605): F446-F454.

Hutchcroft P D. 1991. Oligarchs and cronies in the Philippine state the politics of patrimonial plunder[J]. World Politics, 43(3): 414-450.

Mendoza R U, Beja E L, Venida V S, et al. 2016. Political dynasties and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evidence of linkages in the Philippines[J].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44(2): 189-201.

Mendoza R U, Jaminola L M, Yap J. 2019. From fat to obese: political dynasties after the 2019 midterm elections[R]. Working Paper No. 19-013. Manila: Ateneo School of Government.

Mendoza R U, Yap J K, Mendoza G A S, et al. 2022. Political dynasties, business, and poverty in the Philippines[J]. 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7: 100051.

Querubin P. 2016. Family and politics: dynastic persistence in the Philippin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2): 151-181.

Smith D M, Martin S. 2017. Political dynasties and the selection of cabinet ministers[J].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42(1): 131-165.

Teehankee J C. 2012. Clientelism and party politics in the Philippines[M]//Tomsa D, Ufen A. Party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clientelism and electoral competition in Indones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London: Routledge, 186-214.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Political Dynasties: The Philippine Model

Ronald U. Mendoza[1] Jurel K. Yap[1,2] Gabrielle Ann S. Mendoza[1]
Leonardo Jaminola Ⅲ[1] Erica Celine Yu[3]

(1. School of Government,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2. School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Griffith University;
3.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Digital Sciences, Tilbur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hilippine model can serve as a classic exampl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political dynasties. Political dynasties refer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an incumbent elected official has relatives in elected offices in the past or the present government. This phenomenon is widespread globally, existing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numerous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Philippines, for example, almost 80% of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well over 50% of all elected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from political families. Numerous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political dynasties abuse public power to seize social resources, restrain market competition, erode economic vitality, and exacerbate pover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Philippines shows that political dynasties have exacerbated poverty in provinces outside Luzon, where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has been observed between the two in Luzon's provinces. Further study indicates that independent economic elites in Luzon's provinces have effectively checke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olitical dynasties on poverty. This countervailing effect stems from three mechanisms: economic elites can "vote with their feet"; they can engage in a contest of strength against dynastic politics; and they can form potential interest alignments with political dynasties, thereby jointly driving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Keywords: political dynasties; economic elites; Philippine model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